

历史时期农业考古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评《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

符奎

南京大学刘兴林教授的《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以下简称《农业与乡村》)是一部体系完整、资料翔实、新见迭出的农业考古学专著。全书分为七章,从农具体系、牛耕起源与发展、农田形态、农田水利、农作物结构、粮食储存、乡村聚落和农民生活等方面,对先秦两汉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刘兴林教授从事农业考古与农业历史研究近30年,《农业与乡村》一书,反映了他对农业考古学科的系统反思,反映了他对先秦两汉农业历史的最新认识,是近年来中国农业历史与考古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在研究视野与方法方面,该书的研究具有以下长处:

鲜明的问题意识 独特的研究方法

牛耕是传统农业定型的主要标志之一,它的起源、发展及推广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成果丰硕,但牛耕过程中牛与犁的结合方式,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在系统的学术史梳理基础上,作者敏锐地抓住了牛耕的关键要素——畜力的套驾问题,指出商代虽已有牛耕,但其推广却在战国至秦时期,其主要原因可能就是犁具结构或套驾方式问题,导致此前人们尚未从牛耕中看到明显的效益对比。沿着这一思路,作者利用汉唐丰富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等实物资料,对牛耕图像作了系统分析,归纳出汉代牛耕套驾方式主要有二牛抬杠式绳索系套驾法、单牛独轭式偏系套驾法和一牛一马并耕式套驾法,系统而全面地解决了汉代牛耕套驾问题。

唐代以后牛轭与套盘、套索等新式用具得到改进和推广,但二牛抬杠的牛耕方式仍然比较常见,针对这一现象,作者指出“新技术、新方法出现并不能反映生产力大的变化,只有新技术、新方法推广和普及开来才能形成新的生产力。前者是技术史的发展所着眼的,后者则是经济史研究所要关注的”。这种将技术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农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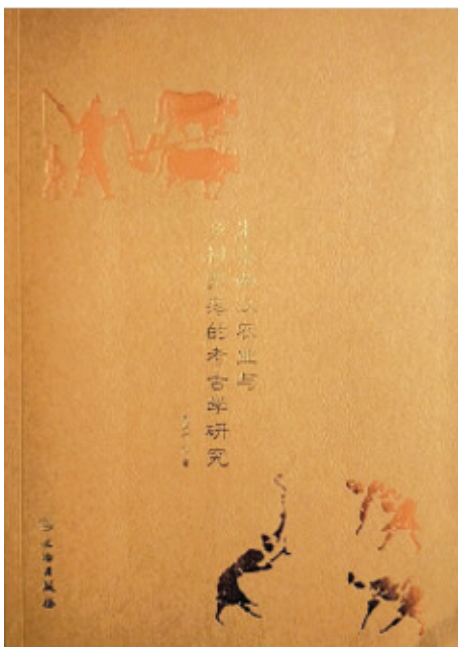
一项农耕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先进性,而且与其他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汉代铁官“大器”(铁犁)的推广,从普及新技

术角度讲,具有必要性,但限于当时耕牛普及的程度,“大器”推广过程中,必然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大地主庄园和富裕农民之家,耕牛已经是必备的生产资料,“大器”能够发挥作用,但对那些养不起耕牛的贫困自耕农而言,官营铁器自然会出现“不给民用”的现象。故此,作者将技术史研究融入经济史研究之中,发现了汉代牛耕技术推广过程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即“牛耕的普及存在阶层上的差异”。《农业与乡村》一书以独特的方法,抓住关键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其结论自然是可靠的。

严谨的微观研究 科学的系统认识

农具,作为人类农业劳动形式的物化表征,不仅可以反映一个生产周期内整地、种植、中耕、施肥、灌溉、收获、加工等环节的特征,而且可以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水平的发展过程。《农业与乡村》对种类繁多的农具作了细致的微观研究,从形制差异到功能异同逐一梳理,并引入“工具套”的概念,系统地归纳了先秦两汉农具体系演变的过程,指出“西汉开始,农具已基本定型并成系统,确立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基本要素、指导思想与技术体系,是我国传统农业的定型期”。汉代,铁犁的形制构造也已基本完备,但学界对其安装与使用方法存在不同的认识,作者认为无论是大铁犁还是中小型的犁,使用时都应是脊面向上安装在木犁底上的,主要依据有三:其一,文献无铁犁脊面朝下使用的记载;其二,技术上,铁质犁铤及其一面凸起的形制适应了安装犁壁的需要,符合犁具发展的规律;其三,三杨庄遗址发现的大铁犁及农田遗迹从考古上证实了脊面向上的安装与使用方法。这一个案研究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解释了铁犁的安装与使用方法,结论科学、严谨、可信。

随着植物考古的发展,越来越多植物遗存被发现。作者对作物遗存时空分布特征和不同地区作物组合演变分析,直观地反映了作物随时代变化而形成的布局与结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别强调了农田杂草研究的意义。根据作物



与杂草伴生规律,在考古实践中,可以依据杂草与作物的常见组合关系来判断与其相伴而生的作物种植情况。作者根据距山东济南唐冶周代遗址直线距离不到20千米的大辛庄商代遗址发现有碳化水稻和水稻植硅体的情况,结合唐冶遗址发现的稻田中常见的莎草科杂草,推测唐冶在周代应存在水稻,并指出唐冶遗址未发现水稻种子遗存的原因,可能是取样的偶然性和取样范围造成。这虽然只是一种学术上的尝试,其结论正确与否有待考古工作的证实,但其方法论意义十分重要。

考古发现的农具和农作物遗存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水平,然而它们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和分散性,只有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才能发掘出其蕴涵的农史价值。在宏观视野下,《农业与村落》对农具与农作物遗存开展了严谨细致的微观研究,在研究视野和具体结论上均有创新性的突破。

在文物与文化间的求索

——评曹兵武《文物与文化》

赵夏

利用之路”长期观察和思考的见证,是一点一滴不断积累丰厚的过程与结果。作为一个参与式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作者既立足于学科与日常的文物工作,又不囿于行业与学科所限,能够在考古、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史学还有其他一些学科之间不断穿梭,同时还能够从更为宏阔的“文化”“社会”“环境”等角度去思考和未来,并尽量保持着知识分子价值关怀的姿态,理性地面对工作中的物、人、事及相关社会环境及文化背景,试图梳理出一些脉络与理论。因此,其所思所想对读者的启发往往是多元的、开阔的。比如在谈到文物保护意义时说到,“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命运,不仅仅是简单的事就论事,而是需要从根本上予以关注,人类自身也才能藉由科学地认识历史而拥有一个更理性和合理的未来。”这一立意和视角可以说已经远超一般从业人员的认知了。书名为《文物与文化》,由文物上升到文化,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文化遗产真实的历史和文化属性及保护管理中复杂的自然和社会属性

“文物”和“遗产”的内容包罗万象,属性多元,相关研究和保护工作也需要综合的知识储备和综合的社会视角。不能就文物来谈文物,就保护谈保护,文物只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而且被认定的“文物”也只是众多文化遗产中能够遗留至今的部分历史和社会的见证,且与不同时期的自然环境、人的认知能力以及相关需求密切相关。想要更加周全和深入地认知文物,则需要以更加宽广的视角去了解它的前世今生以及相关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与此同时保护、管理、展示、宣传等也是综合性极强的系统工作。所以作者提出,“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也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利益、力量、资源的认识、调节和配置过程”,同时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问题。

因此,对待文物及文化遗产的态度,作者主张不能只满足于外在表象,更应开展“复杂的多学科系统性综合研究”,既要有溯本求源的科学探索精神,也要追寻与文化、与社会相关联的价值,更好地了解其丰富的信息和内涵,与之密切相关的环境,以及可能的价值、意义和启发。

“文物”“遗产”有其客观性的一面,同时因其认知、研究、保管、阐释、传播都离不开与之密切相关的“人”“价值认知”“环境”等要素,所以又有了主观的选择性和现实性的一面。“人”既包括那些掌握话语权的权威人士,也包括与之关系密切的社区及普通大众;既包括当代的人,也应考虑到未来的人。“价值”既包括历史、艺术、科学等基本价值,也应考虑到更多维度更多时空的综合价值,而且价值认知往往是会“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而有一个不断丰富呈现过程,它是动态的、发展的和不断积累的”。“环境”既包括社会环境,也包括与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人与遗产共存互惠的生态、业态、心态“三态理论”,据此可以更为复合地理解遗产及其保护利用的综合性

扎实的理论基础 精准的学术前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事农业历史研究,必须具备扎实的农学理论与知识。《农业与乡村》对考古发现的农业遗迹、遗物和间接材料进行了系统研究,按照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它们整合为:生产工具——劳动方式(牛耕等)——田地形态——田间管理(灌溉等)——作物构成——储藏和加工——聚落和农民生活,这一农业社会有机系统。这样一个宏观的体系,将农业生产过程与农民生活状态结合在一起,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先秦两汉农业、农村、农民的整体状况,反映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基础。

针对历史时期农业考古研究趋冷的局面,作者指出应当跳出考古证史的旧圈子,在对考古与文献材料分析过程中,不能紧抱证、补的目的而刻意地向文献或考古材料靠拢,为它们做注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历史时期农业考古研究出现新的生机。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作者打通了史前农业考古与历史时期农业考古之间的界限,将各种农业考古资料还原到农业社会系统之中,明确指出历史时期农业考古研究的方法与目标:“把农业遗存、遗物看作是农业社会系统中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解释考古材料,把农业历史上所发生的事落实到具体的生产方式、农田形式、村落组织和从事农作的人群。”在这样的史学理论与思想指导下,《农业与乡村》精准地把握住了学术研究的前沿,对先秦两汉乡村聚落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班固《汉书·食货志》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等资料反映百姓居住在里门、垣墙等建筑设施完备的封闭性里内,这是否是当时民居形式的真实反映,其普遍性如何,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作者在新出简牍与聚落遗址等资料的基础上,指出秦汉时期乡村聚落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有大城中带有围墙的里居、有围墙的邑里、没有围墙的相对集中的里居、散居形式的自然聚落等多种形式。关于文献中出现较多的聚,作者认为它与乡均在里之上,但尚未被纳入

国家正规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是乡邑与里居之间的中介,作用类似于今天介于乡镇和村之间的管理区。先秦两汉聚落形态的演变可以反映古代社会发展的历程,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先秦两汉社会性质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农业与乡村》将聚落研究纳入视野,所作的开创性探索,必将推进先秦两汉聚落研究的进展。

资料与方法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但凡取得了突破的学术领域,要么是发现了新的资料,要么是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者是二者的结合。中国农业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农业考古学,其结论均建立在坚实的考古资料基础上,故此资料的缺乏往往导致有些问题的研究不能充分展开。《农业与乡村》一书虽然已经指出先秦两汉基层聚居包括里、廛、聚、落、格、屯、乡、邑等多种形态,但在探讨行政里与自然聚落关系时,仅仅分析了行政里与聚之间的关系,其他形式或名称的自然聚落与行政里的关系如何,并未详加研究。此外,长沙东汉简牍所见“丘”与里的关系,是汉代里聚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需要将其纳入先秦两汉乡村聚落形态演变研究之中。《农业与乡村》关于乡村聚落形态的研究,重两汉轻先秦,其主要原因正是资料的缺乏。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研究视野和方法的创新,相关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综上所述,虽然《农业与乡村》一书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仍然存在继续深化的空间,但是从学术研究视野与方法论角度看,该书具有鲜明的学术史和问题意识,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采用独特的研究方法,将微观分析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对学术前沿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成果丰硕,学术意义不言而喻。在当前历史时期农业考古研究趋冷的局面下,这样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的专著出版,必将激发学界对农业考古学学科体系构建与发展前景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从而推动中国农业历史与考古研究的发展。

《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刘兴林著,文物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定价180元



关注该书作者,始于在网上读其博文。一度有闲时,喜欢拜读搜狐网上有趣的博文,遇见好文便点击“关注”。一旦博主的博文更新,我的“个人中心”便会收到提醒,从而可以及时读到。初读作者博文,感觉其与文博工作有关,且书写和关注面甚广,有考古、有保护、有管理,涉及到行业内的诸多事件及议题,并总能从“文化”“学术”“社会”“人”等宽广的角度深入地去解读,估计是行业里的同仁,于是就毫不犹豫地“关注”了。时间久了,读文多了,自然便知其人了。后来,有幸参与了作者所主持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并得赠其《文物与文化》一书,从而有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相关文章。

此书出版于2013年,基本上收录了作者近十年来发表于报刊上与文物及其保护相关的文章,不过看“后记”形成于2010年,绝大多数文章实际上也是此前的了,时间至今已经过去了七年有余。七年的时差,也许对于很多新闻报道性或公文式文章而言,已经很难引发人们的阅读兴趣了,不过此书却依然能够给人诸多收获和启发。其间原因,除了文物与遗产主题永恒性,我想主要还是得益于作者对现象、事件、论点的诸多深入思考,理论思考和有生命力的思想同样是不会过时的。

书之行文流畅易读,于是前后一月的时间里我一页一页地认真翻过,并做了摘录和笔记,从而对相关内容和作者的思考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读完掩卷而思,有几点很直接的感受。

涉及面广 自成体系 立意甚高

此书包括文化遗产新视角、文化遗产价值论、文化遗产保护论、市场经济中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传播等几大板块,具体涉及到“文物”“文化遗产”的认知、保护、传播、利用、管理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分析和人文关怀等诸多方面,并冠以副题“文化遗产学论集”,显示出作者建构学科的努力和尝试。书之主线恰如作者《后记》之标题——“文化遗产·文化自觉·文化建设——追寻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心路历程”,是其基于文化遗产实际工作,从“文物”“文化遗产”自身以及“文化自觉”和“文化建设”角度去思考和探寻事业与学术发展的路径。

实际上,此书也可视为作者对我国“文物保护

前不久,黄山市徽州区潜口民宅博物馆的吴青馆长来合肥办事,给我带来一本厚厚的460多页的大书——《潜口民宅搬迁修缮工程报告》(下文简称《报告》),让我喜出望外。本以为是他们出的文物图录,看了书名,更加高兴。因为,这不是一本一般的文物古迹知识的介绍图书,而是一部涉及到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搬迁与建设史的工程报告,建设工期从1984年到2007年,时间跨度长达23年,是安徽省文物保护工程史上跨度最长、涉及面最广、而且完全由国家财政投资建设的文保工程——潜口民宅。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进入到一个非常窘迫的时期。一方面是各级财政困难,没有足够的钱投入于数以万计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维修;另一方面,有些价值巨大、年代久远的木构古建筑因地方建设的需要及其他种种原因又不得不面临拆迁损毁的宿命。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文物局根据安徽省文物部门上报的材料,决定集中搬迁一批有特点的建筑类型,异地保护,从而就《报告》后记所说:“在秉承文物保护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古民居的‘再生’和可持续利用,一时间成为破解皖南古民居保护困局的成功典范,被业界誉为‘潜口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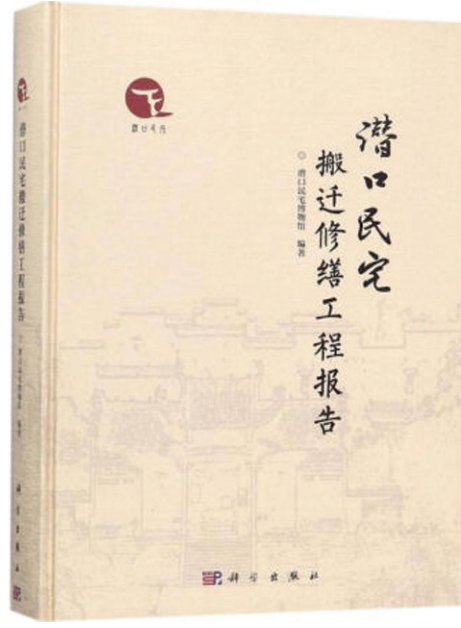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四十年,安徽省的文保工作有了很大的变化与进展,仅就文物维修一项而言,全省的维修项目超过3000多处,投入的资金超过百亿元。然而,粗放式的管理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这么多的维修工程,居然没有出版一本工程技术报告,不能不说既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又是主政者、实施者管理思路狭隘的一种曲折反映。重大项目、重资金申报、重修修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轻视档案、轻技术传承、轻修缮记录的整合出版,实在是我省文物保护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并迅速切实改变的一件大事。如何实现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图书的零的突破?这个任务,省文物局没有完成,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文保中心没有完成,16个省辖市的文物单位也没有完成,最后由一个区的专题博物馆来完成了这个突破,这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也不能不让人发出感叹。

潜口民宅搬迁修缮工程,先后付出了安徽文博人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保留了大量的勘察文字、测绘资料、实物照片、施工记录、工程图纸和研究报告,并且散落各处,搜集整理十分困难。2015年,潜口民宅博物馆吴青馆长决定,组织专门班子,整理出版工程报告,对历史、对后人做出交代。经过三年持续不断的工作,终于编成此书并出版。全书总计分成三大部分:包括司寇第、乐善堂为代表的全部二十四幢明清建筑的彩版照片与现状;还原古建原址及拆迁中的图片资料;记述搬迁修缮的过程和文物建筑的布局描述。400多幅测量线图与构件图以及数据,构成了与其他文物图书显著不同的科学特色。

位于徽州区潜口村紫霞山麓的潜口民宅明清建筑群,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黄山徽州区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回顾历史,建设的选址与建筑的复原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国际旅游界当下十分注重文物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前提下,限于当时的资金与技术,选址于荒山坡上,缺少相应的人文环境,致使一幢幢毫无关联的建筑类型缺少有机组合,成为一个缺少生命活力的建筑模型,在搬迁时又疏于明代与清代建筑技术的研究与细微记录,致使明清两代乡土建筑建造技术的信息流失,仅仅只是建筑轮廓和构件的复原,没有在材料、地基、粘合材料的试验上更细心地研究,都是值得记取的教训。另外,该工程在启动阶段,当时还没有成立徽州区,属于歙县的徽州镇。《报告》应对这一历史背景下的相关人事与建筑归属与区划变更等等,做进一步的交代,这也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尽管《报告》有些微瑕疵,但是它的出版,对安徽省的文保工程质量的提高和示范意义还是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我因此撰文推荐宣传,并希望安徽全省各地的文博单位向徽州区潜口民宅博物馆的同志们学习,勤政勤奋,做出与时俱进的努力,进一步提高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水平。

《潜口民宅搬迁修缮工程报告》,潜口民宅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定价280元



安徽文物保护的第一部工程报告

张宏明

《文物与文化》,曹兵武著,故宫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定价56元